

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杨晓军

【摘要】文章利用中国 2006~2014 年城市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 GMM 估计方法,基于全国、区域和城市规模层面考察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有利于促进人口向城市流动,东部地区城市表现尤为突出,且影响效应与城市规模呈明显的正相关;从公共服务质量类型来看,医疗服务质量的总体贡献程度最大;东部地区城市的医疗服务质量、中部地区城市的环境服务质量和西部地区城市的文化服务质量均对人口流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00 万及以下人口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外来流动人口影响不显著,而 200 万以上人口城市依靠优良的医疗服务质量能够有效地吸引外来流动人口。

【关键词】公共服务质量 人口流动 城市

【作者】杨晓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表现为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和沿海地区,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影响流动人口向城市集中趋势的因素很多,其中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通常工资收入水平高、就业机会好,对外来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然而,户籍制度的约束使外来流动人口难以真正享有城市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口流动。对此,中央政府采取多项措施保障流动人口真正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例如,2014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促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扩大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2016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明确鼓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本地承载能力不断扩大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标准,缩小与户籍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因此,有效衡量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考察流动人口是否会在城市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而减少流动,进而科学地认识和了解城市公共服务对人口流动的空间聚集作用,对有效管理城市流动人口、推动城镇化发展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者较早关注到公共服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Tiebout(1956)提出公共服务对人们居住地选择的作用,认为人们会趋向于选择最符合其公共产品偏好类型的地区居住。随后学者们开始利用 Logit 模型和微观家庭数据对此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多数研究发现地方公共服务对家庭居住地选择有正向影响(Friedman,1981;Nechyba 等,1998;Bayoh 等,2006;Dahlberg 等,2012),但也有研究发现当地公共服务对家庭居住地选择有负向影响(Quigley,1985),还有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对家庭居住地选择不存在影响(Rapaport,1997)。此外,有学者利用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当地公共服务供给对外来人口的流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Day,1992;Anderson 等,1997;Rodríguez-Pose 等,2012;Dustmann 等,2014)。

户籍制度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外出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动力由于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不能真正享受城市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城市公共服务(夏纪军,2004;乔宝云等,2005)。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区域间人口流动性逐渐增强,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公共服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一是基于公共服务支出视角,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或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地方公共服务支出有利于增加外来人口的流入或迁入(张光、尹相飞,2015);二是基于城市公共服务多维度视角,发现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因素,人口或劳动力会倾向于流向公共服务好的城市(李拓、李斌,2015;夏怡然、陆铭,2015;侯慧丽,2016;杨刚强等,2016;覃成林、刘佩婷,2016)。

上述研究侧重于从居民个人或家庭的微观视角进行分析,无法反映城市流动人口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宏观状态;所使用的数据以全国或省级数据为主,较少涉及城市面板数据;基本没有考虑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供给对人口流动影响的差异。为了克服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通过挖掘和梳理 2006~2014 年城市面板数据,重点从区域和城市规模层面具体考察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及其差异。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

(一) 基本假说

中国城镇化的重点是人的城镇化,是让外来流动人口能够平等地享受到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公共服务,让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因此,作为一种具有稀缺性的公共产品,城市公共服务质量会直接促进人口向城市流动,影响人口流动的数量和质量。流动人口往往倾向于流向公共服务质量高的城市。充裕的公共教育资源、完备的文化服务设施、先进的医疗卫生设施、发达的交通通讯和良好的自然环境,均会促进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是促进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因素,二者呈正相关。

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包括很多方面,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将公共服务质量分为教育服务质量、文化服务质量、医疗服务质量、交通服务质量和环境服务质量 5 个方面。由于不同公共服务质量类型具有较强的自身特征和独立性,其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也会存在差异。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提出假说 2:不同公共服务质量类型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会存在差异。

从区域层面来看,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城市,东部地区城市由于公共服务质量较高,有利于吸引大量流动人口的进入,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在环境服务质量和文化服务质量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优势,进而对流动人口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从城市规模层面来看,规模较大的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因为拥有丰富而优质的公共服务,也形成了大量流动人口集中的态势。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提出假说 3: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存在区域和规模差异,且东部地区或规模较大的城市由于存在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二) 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假说,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是促使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考虑到人口流动存在一定的惯性,因此,本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为:

$$PM_{i,t} = c + \alpha PM_{i,t-1} + \beta PS_{i,t} + \gamma X_{i,t} + v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PM 代表城市流动人口数量, PS 代表城市公共服务质量, X 代表控制变量, c 为常数项, α 、 β 、 γ 分别代表各自变量的估计系数, i 代表城市, t 代表年份, v 代表随时间变化的时间效应, ε 代表独立同分布随机扰动项。

为了更好地衡量公共服务质量类型对城市人口流动的影响,本文还建立细分公共服务类型的动态面板模型,即:

$$PM_{i,t} = c + \alpha PM_{i,t-1} + \beta_1 EDU_{i,t} + \beta_2 CUL_{i,t} + \beta_3 MED_{i,t} + \beta_4 TRA_{i,t} + \beta_5 ENV_{i,t} + \gamma X_{i,t} + v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EDU 代表城市教育服务质量, CUL 代表城市文化服务质量, MED 代表城市医疗服务质量, TRA 代表城市交通服务质量, ENV 代表城市环境服务质量。

(三) 数据与变量说明

1. 城市流动人口

由于国家没有明确公布各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因而无法准确获取城市流动人口数量的精确面板数据。现有研究中关于城市流动人口数量的数据主要来自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这些数据均缺乏时间上的连续性,难以有效满足面板模型计量分析的要求。《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公布了城市市区暂住人口数据,并将其界定为“离开常住户口地的市区或乡、镇,到本市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员”。尽管该数据中没有

包含在本市居住半年及以下的流动人口,但考虑到这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时间较短,与城市公共服务的联系相对较弱,因此本文将《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城市市区暂住人口界定为城市流动人口。

表 1 给出了 2006~2014 年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变化趋势。从全国层面来看,城市流动人口基本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从 2006 年的 6 107.0 万人增加到 2014 年的 9 217.4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5.28%,略高于全国总体流动人口的年均增长率^①。从区域层面来看,城市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比重相差无几。具体来看,东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虽然较多,但其占全国比重却从 2006 年的 70.79% 下降至 2014 年的 60.98%,下降了近 10 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虽然较少,但其占全国比重却分别从 2006 年的 15.47% 和 13.74% 增长到 2014 年的 20.08% 和 18.94%。此外,虽然各地区城市流动人口均呈稳步增长的态势,但增长速度存在差异,西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率最大,为 9.59%,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率次之,为 8.77%,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率最小,仅为 3.34%。从城市规模层面来看,随着城市规模增加,城市流动人口所占比重也随之增加。具体来看,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 200 万以上人口城市,占全国的比重维持在 50%~60%,其次是 100 万~200 万人口城市,占全国的比重维持在 10%~12%,最后是 100 万及以下人口城市,占全国的比重稳定在 8% 左右。此外,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也呈逐步增长的态势,但增长速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年均人口增

表 1 2006~2014 年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变动趋势

万人

	年 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全国	6107.0	5811.0	5966.0	6033.0	7103.0	7682.6	7982.9	8690.7	9217.4
东部地区	4323.0	4309.0	4127.0	4036.0	4634.0	5137.3	4733.1	5252.5	5621.1
中部地区	945.0	724.0	956.0	1018.0	1196.0	1203.8	1583.4	1712.0	1850.8
西部地区	839.0	778.0	883.0	979.0	1273.0	1341.5	1666.4	1726.2	1745.5
100 万及以下人口	427.0	458.1	483.7	490.3	553.7	611.7	665.9	692.2	768.8
100 万~200 万人口	685.8	616.0	681.4	594.1	695.2	807.8	909.9	1028.1	1079.7
200 万人以上人口	3547.0	3644.0	3273.5	3202.7	4000.1	3790.3	4513.7	5087.1	5299.3

注:城市规模的划分标准以 2014 年市区常住人口数为依据,且市区常住人口数为城市市区暂住人口和公安部门的户籍人口数之和,数据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按城市规模划分的城市样本仅包括地级及以上城市。

① 根据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从 2000 年的 1.22 亿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2.21 亿人,再增加到 2015 年的 2.47 亿人,年均增长率为 4.81%。

长最快的是 100 万及以下人口城市, 年均增长率为 7.63%,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次是 100 万~200 万人口城市, 年均增长率为 5.84%, 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最后是 200 万以上人口城市, 年均增长率为 5.15%, 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 城市公共服务质量

在教育服务质量方面, 选择普通高等学校师生比、普通中学师生比和小学师生比作为代理变量。在文化服务质量方面, 选择剧场、影剧院数和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数作为代理变量。在医疗服务质量方面, 选择医院及卫生院数、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和医生数作为代理变量。在交通服务质量方面, 选择年末实有出租汽车数、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和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作为代理变量。在环境服务质量方面, 选择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和覆盖率作为代理变量。原始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由于衡量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各代理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直接将其放入回归模型中会存在多重共线性, 因此本文将代表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代理变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分别选取其第一主成分的得分值放入实证模型中。

由于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涉及很多方面, 在此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医疗服务质量来衡量其变化趋势。在医疗服务质量的第一主成分得分值中, 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变量所占比重较高, 因此, 通过该变量来衡量城市医疗服务质量的变化趋势(见表 2)。从全国层面来看, 城市医疗服务质量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 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从 2006 年的 179.0 万张增加到 2014 年的 316.2 万张, 年均增长率为 7.37%。从区域层面来看, 城市医疗服务质量从东向西呈依次递减的态势。具体来看, 东部地区城市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占全国比重虽高, 但所占比重从 2006 年的 45.19% 下降到 2014 年的 41.74%, 床位数年均增长率为 6.31%,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所占比重虽然较低, 但所占比重分别从 2006 年的 32.40% 和 22.41% 增长到 2014 年的 33.62%

表 2 2006~2014 年中国城市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的变动趋势 万张

	年 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全国	179.0	185.9	198.5	217.2	227.8	244.7	269.9	294.6	316.2
东部地区	80.9	85.0	90.0	97.0	99.4	104.3	112.8	124.7	132.0
中部地区	58.0	59.2	64.0	69.6	74.7	81.3	90.9	98.3	106.3
西部地区	40.1	41.7	44.5	50.6	53.7	59.2	66.3	71.6	77.9
100 万及以下人口	36.4	37.2	41.1	44.1	45.1	48.9	53.5	56.8	61.8
100 万~200 万人口	39.1	39.5	41.0	47.3	49.8	52.3	58.6	65.2	69.4
200 万以上人口	103.5	109.2	116.4	125.8	132.9	143.4	157.8	172.6	185.0

注: 样本为全国 2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不包括三沙市、毕节市、铜仁市和海东市。

和24.64%,床位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86%和8.65%,从城市规模层面来看,城市医疗服务质量与城市规模呈明显的正相关。具体来看,20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医疗服务质量远高于其他规模城市,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占全国的比重基本维持在58%左右,年均增长率为7.53%;100万~200万人口城市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占全国的比重基本维持在22%左右,年均增长率为7.45%,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0万及以下人口城市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占全国的比重基本维持在20%左右,且年均增长率为6.82%,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代表其他影响城市人口流动的因素,本文选择的具体控制变量为:经济发展水平(ED)、城市工资收入水平(SA)、劳动力市场失业率(UE)、固定资产投资(PA)和地方财政支出(FE)。经济发展水平选择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代理变量。城市工资收入水平选择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作为代理变量。失业率选择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与城镇劳动力总量之比作为代理变量,其中城镇劳动力总量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与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三者之和。固定资产投资选择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代理变量。地方财政支出选择公共财政支出作为代理变量。原始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实证分析中所涉及的城市均为地级及以上城市,2014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量为290个,剔除统计信息数据不完整的部分城市^①,最终选取的实证分析数据为2006~2014年27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②。考虑到实证分析的需要,本文采用平衡面板数据,对部分城市个别代理变量的缺失值进行了线性插值处理。城市流动人口数据采用的是市区数据,而其他变量采用的均为市辖区数据,本文假定市区和市辖区的地理含义是相同的。表3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4给出了全国层面系统GMM估计的回归结果。其中,Wald检验结果表明,回归系数整体显著;AR(2)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残差序列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模型可以允许一阶自相关的存在),由此可见,采用系统GMM对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是有效的。

① 由于北京、上海、青岛、长沙、株洲、深圳、湛江、潮州、三亚、三沙、毕节、铜仁、拉萨、西安和海东市缺乏城市流动人口和相关代理变量数据,故将这些城市样本剔除。

② 研究期间内,少数几个城市改名,如2007年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2010年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在此数据进行合并统一处理,以保证实证分析数据的连续性。

表 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n=2475)

变量	定 义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PM	城市流动人口数量(万人)	686.40	0.03	19.64	53.62
HER	普通高等学校师生比	37.68	0.05	5.85	2.16
RSR	普通中学师生比	21.02	0.78	7.21	1.81
PSR	小学师生比	16.88	0.47	5.77	1.37
THC	剧场、影剧院数(个)	133.00	1.00	6.14	9.93
CPL	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件)	6.74	0.01	0.76	0.75
HHC	医院及卫生院数(百个)	9.03	0.03	0.70	0.83
BHH	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万张)	10.35	0.04	0.75	0.89
DOC	医生数(万人)	42.56	0.20	3.82	4.65
TAX	年末实有出租汽车数(千辆)	31.94	0.09	2.54	3.52
PTV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辆)	31.59	0.32	6.94	4.45
APR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108.37	0.02	10.64	7.34
AGL	绿地面积(千公顷)	132.45	0.02	4.99	10.31
GCA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千公顷)	50.49	0.01	4.00	5.08
GCR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71.81	0.38	37.34	8.15
ED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32.60	0.32	4.50	3.25
SA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万元)	9.24	0.74	3.44	1.29
UE	失业率(%)	21.13	0.22	3.39	2.10
PA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百亿元)	99.20	0.04	4.49	7.64
FE	公共财政支出(百亿元)	20.28	0.02	0.89	1.51

从回归结果来看,人口流动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城市人口流动过程中存在着较强的路径依赖现象,同时反映出城市人口流动的弹性较大。

模型 1 只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流动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这与现实人口流动情况相吻合。模型 2 只考虑城市公共服务总体质量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可以发现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同样

对人口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同时纳入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时,可以发现模型 3 中公共服务质量依然显著,这说明人口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除了考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外,还会考虑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模型 4 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系数仍然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通过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质量能够有效地促进人口的流入,与假说 1 相符合。

模型 5 只考虑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类型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教育服务质量、文化服务质量、医疗服务质量、交通服务质量和环境服务质量对城市人口流动均具有正向影响,但仅有医疗服务质量和文化服务质量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提高城市医疗服务质量和文化服务质量能够更有效地促进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因此,假说 2 成立。模型 6 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模型 7 中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城市医疗服务质量对人口流动仍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 区域层面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由于中国地区间城市公共服务存在明显的差异,对城市人口流动的影响可能并不相

同,因此需要从区域层面进行实证分析^①。表5给出了区域层面系统GMM估计的回归结果。其中,Wald检验结果表明回归系数整体显著;AR(2)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残差序列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因此,系统GMM对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有效。

在城市公共

服务质量的代理变量中,城市公共服务总体质量的系数均为正值,从影响程度来看,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这充分说明东部地区城市由于拥有较高的公共服务质量而能够更有效地吸引外来流动人口,这与假说3相符。从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类型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医疗服务质量对人口流动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其他公共服务质量均不显著,这可能与流动人口难以享有这些公共服务有关。中部地区城市环境服务质量对流动人口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中部地区城市应该注重发挥自身的环境服务质量优势来吸引外来流动人口。西部地区城市文化服务质量的影响程度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西部地区城市提升文化服务质量对外来流动人口有较强的吸引力。

(三) 城市规模层面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中国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市场差异较大,不同城市由于人口规模等特征差异而形成了公共服务的供给差异。为了考察不同规模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本文以2014年市区常住人口数划分城市规模,分析不同城市规模的公共服务质量对城市人口流动的影响。表6给出了城市规模层面的系统GMM估计的回归结果。

表4 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n=2200)

变量	城市流动人口数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i>LPM</i>	0.802***	0.605***	0.604***	0.603***	0.615***	0.614***	0.606***
<i>PS</i>		9.331***	8.320***	4.950***			
<i>EDU</i>					0.024	0.171	0.194
<i>CUL</i>					2.238*	2.130	1.798
<i>MED</i>					11.266***	9.875**	6.158**
<i>TRA</i>					0.724	0.508	0.427
<i>ENV</i>					1.486	1.779	0.793
<i>ED</i>	2.740**		1.456	0.948		1.342	0.931
<i>SA</i>				0.317			0.626
<i>UE</i>				-0.008			-0.036
<i>PA</i>				0.276			0.148
<i>FE</i>				4.271			4.367
常数项	-5.746*	10.401***	-0.261	-5.852	6.436***	0.357	2.037
Wald χ^2	2812.73	782.03	865.62	900.41	620.56	670.93	661.00
AR(1)检验	-2.750	-2.628	-2.678	-2.658	-2.627	-2.655	-2.616
AR(2)检验	-0.784	-0.993	-0.922	-0.936	-0.938	-0.887	-0.91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① 由于西藏自治区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只有拉萨市,而拉萨市由于统计数据不完整而被剔除,因此在区域层面主要分析30个省份的城市。

表 5 区域层面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i>L.PM</i>	0.580***	0.579***	0.534***	0.534***	0.308**	0.319**
<i>PS</i>	7.253***		3.260*		5.708**	
<i>EDU</i>		-0.653		0.039		0.397
<i>CUL</i>		5.934		-1.047		2.214*
<i>MED</i>		9.109**		1.873		6.563
<i>TRA</i>		-0.959		0.068		0.925
<i>ENV</i>		-0.153		4.771**		1.440
<i>ED</i>	2.250	2.059	-0.803	-0.951	-0.600	-0.542
<i>SA</i>	1.165	0.652	-0.249	-0.073	-1.718	-1.712
<i>UE</i>	-0.473	-0.523	0.072	0.133	-0.376	-0.384
<i>PA</i>	-0.326	-0.454	0.162	0.143	2.074***	1.978***
<i>FE</i>	6.734	6.622	10.840	10.580	-2.101	-2.616
常数项	-17.210	4.254	4.367	-0.387	12.360**	12.450**
Wald χ^2	2331.72	2232.52	939.91	1624.36	9350.82	8270.46
AR(1)检验	-2.171	-2.133	-1.733	-1.732	-0.963	-0.916
AR(2)检验	-0.951	-0.948	1.371	1.400	-1.179	-1.031
样本量	752	752	784	784	664	664

注:同表 4。

表 6 城市规模层面的回归结果

变量	100 万及以下人口		100 万~200 万人口		200 万以上人口	
<i>L.PM</i>	0.837***	0.839***	0.571***	0.564***	0.578***	0.559***
<i>PS</i>	0.067		1.287**		10.759***	
<i>EDU</i>		-0.002		-0.325		0.418
<i>CUL</i>		-0.044		0.460		8.611
<i>MED</i>		0.183		0.160		21.393**
<i>TRA</i>		0.009		0.929		-3.733
<i>ENV</i>		-0.033		0.577		-1.890
<i>ED</i>	0.052	0.040	0.266	0.316	1.789	1.570
<i>SA</i>	0.522**	0.512**	0.751	0.945	-0.976	-0.033
<i>UE</i>	-0.017	-0.017	-0.373	-0.357	-0.833	-0.810
<i>PA</i>	0.035	0.039	0.483	0.445	0.539	-0.009
<i>FE</i>	1.672**	1.631**	-4.882*	-4.324	3.647	3.420
常数项	-2.686**	-0.566	2.747	1.922	-2.616	7.252
Wald χ^2	588.16	533.55	229.92	186.61	794.55	586.98
AR(1)检验	-4.368	-4.380	-2.280	-2.292	-2.395	-2.309
AR(2)检验	-0.686	-0.723	0.938	0.946	-0.973	-0.922
样本量	1048	1048	648	648	504	504

注:同表 4。

在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代理变量中,城市公共服务总体质量的系数均为正且系数值与显著性水平均逐渐增加,说明不同规模城市的公共服务总体质量不仅会对城市人口流动具有正向影响,且随着城市规模增加,影响程度也随之增加,这也与假说 3 相符合。从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类型来看,200 万及以下人口城市中,各项公共服务质量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均不显著;200 万以上人口城市中,医疗服务质量则对人口流动有显著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100 万及以下人口城市的工资收入水平和地方财政支出对人口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地方财政支出对 100 万~200 万人口城市的人口流动反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总体来看,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有利于促进人口向城市流动,而提高城市医疗服务质量能够更有效地促进流动人口进入城市;(2)不同地区城市公共服务总体质量均对人口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地区城市表现尤为突出,且东部地区城市通过拥有较先进的医疗卫生设施、中部地区城市通过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质量、西部地区城市通过拥有较完备的文化服务设施而形成了自身比较优势,能有效地吸引外来流动人口进入城市;(3)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人口流动的正向影响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增加,200 万及以下人口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外来流动人口吸引力不显著,而 200 万以上人口城市主要通过优良的医疗服务质量吸引外来流动人口。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论,本文结合中国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城市政府部门在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应该充分意识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关键因素,经济发达城市自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入,因此应将流动人口作为长期存在的现象来看待,为其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让其与户籍人口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而经济落后城市在吸引流动人口工作方面,首要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发展本地经济,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进而对流动人口产生更强的吸引力。(2)充分考虑到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扩大对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如在教育服务方面,消除教育服务对流动人口的限制,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平等的享受公共教育的权利,尤其是基础阶段的公共教育服务;在文化服务方面,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既加大其对流动人口公共文化服务免费开放的力度,又注重建设流动人口获取公共文化服务信息的渠道;在医疗服务方面,加强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建设,为流动人口提供最基本的设施保障,同时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为其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使其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交通服务方面,加强城市公共交通和道路建设,让流动人口真正享受城市公共交通的便利与优惠;在环境服务方面,注重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增加城市环境的宜居性,以增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3)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应该充分考虑城市的地理特征和人口规模差异。由于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因区域位置和城市规模而存在差异,这就要求不同城市在制定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措施时需要找准各自的侧重点。东部地区和 200 万以上人口城市在继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也应注重改善交通服务质量和环境服务质量,有效避免其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作用;中西部地区城市应该注重发挥其环境服务质量和文化服务质量的的优势以更好地吸引流动人口;200 万及以下人口城市应该全面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水平,以发挥其对人口流动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1. 侯慧丽(2016):《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差异及其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2. 李拓、李斌(2015):《中国跨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基于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3. 乔宝云等(2005):《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4. 覃成林、刘佩婷(2016):《行政等级、公共服务与城市人口偏态分布》,《经济与管理研究》,第11期。
5. 夏纪军(2004):《人口流动性、公共收入与支出——户籍制度变迁动因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6. 夏怡然、陆铭(2015):《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
7. 杨刚强等(2016):《家庭决策、公共服务差异与劳动力转移》,《宏观经济研究》,第6期。
8. 张光、尹相飞(2015):《流动人口与地方教育财政投入——基于2000~2011年跨省数据的实证分析》,《教育与经济》,第6期。
9. Anderson, K., Cerslen, F. (1997), Local Public Services and Migration: Educational Change Evidence from Norwegian Municipalities. *The Review of Regional Studies*. 27(2): 123-142.
10. Bayoh I., Irwin E. G., Haab T. (2006), Determinants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Choice: How Important Are Local Public Goods in Attracting Homeowners to Central City Location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46(1): 97-120.
11. Dahlberg M., Eklöf M., Fredriksson P., Jofre-Monseny J. (2012), Estimating Preferences for Local Public Services Using Migration Data. *Urban Studies*. 49(2): 319-336.
12. Day K. M. (1992),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Local Public Good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5(1): 123-144.
13. Dustmann, C., Okatenko, A. (2014), Out-Migration, Wealth Constraints, and the Quality of Local Amenit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0: 52-63.
14. Friedman J. (1981), A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of the Role of Local Public Services in Residential Choice. *Urban Studies*. 18(3): 347-358.
15. Nechyba T. J., Strauss R.P. (1998), Community Choice and Local Public Services: A Discrete Choice Approach.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8(1): 51-73.
16. Quigley J.M. (1985), Consumer Choice of Dwelling, Neighborhood and Public Service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5(1): 41-63.
17. Rapaport C. (1997), Housing Demand and Community Choi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2(2): 243-260.
18. Rodríguez Pose A., Ketterer, T.D. (2012), Do Local Amenities Affect the Appeal of Regions in Europe for Migrant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2(4): 535-561.
19. Tiebout C.M. (1956),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5): 416-424.

(责任编辑:李玉柱)